



章敬平◎著

新闻人的江湖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
 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新闻人的江湖

章敬平◎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序 言

自1998年夏天那个大雨滂沱的午后，急急赶往合肥市中市区32号合肥晚报社递交派遣报到证的那一刻起，我已在新闻江湖漂泊流浪了11个年头。

这超出了我关于这份职业的心理预期。曾经，我希望自己能在从业十周年之前，结束一个新闻人的旅行。

是所谓人算不如天算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

由不得自己的事，从这本书的书名，就可以窥见一斑。

两年多以前，这本书打算以《新闻人的光荣与梦想》留名于世。岂料，出版商不同意，他觉得这个书名太宏大，太正点，多了点装腔作势，少了点率性随意。

想想也是，我既不是司马光，也不是威廉·曼彻斯特，写的不是《史记》，也不是《光荣与梦想》，何必正襟危坐，皱着眉头扮深刻？

我听从了出版商的意见，将本书更名为《新闻人的世界》。我觉得这样的书名平实，朴素，与我彼时的心境倒也吻合。

彼时，我刚刚从法学院拿到博士学位，对读书的认识，已从求生存过渡到求智慧，对人生的体悟，从重胜负转变为重苦乐，对新闻的感受，也从志业改变为职业。至于少年得志、出名要趁早之类的词句，我已不再那么执著。

你在本书中看到的那些一挥而就的、书生意气的“大我宣言”，大多是此前写出来的。此后，我已将新闻理想，淡化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方法论，我用“放下枪比剑”之类的比喻，劝勉自己不要混淆“术”与“道”的界限，任由虚词、大词败坏新闻业的规则。

此前此后的不同心态，就是本书以“术”和“道”命名第一、第二部分的缘起。

2007年秋，原想读博士后的我，不再夸大使命的我，去了《南方周末》，以一个笔名，继续我在新闻江湖的旅行，续写《新闻人的世界》。

一年后,我开始交稿。有趣的是,将书稿命名为《新闻人的世界》的那个出版商,改换了门庭,书稿不得不转手易人。

接手的浙江人民出版社,像女人反感男人的白面无须一样,讨厌书名的平淡寡味。喜欢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考虑书名的他们,觉得“世界”一词,不能打动市场,要求我改。

版权是人家买去的,风险是人家承担的,不按人家的牌理出牌,似乎说不过去。

我妥协了,“世界”很快变成了“江湖”。他们说,好,这个词,水深,浪急,有深意。

既是江湖,就得有些匪气,有些侠气,有些书生气,有些殊胜因缘,有些缘聚缘散。于是,我以江湖弟子的口气,重新润色了每一章的标题和导语,并且信笔由缰地增写了本书的第三部分——“江湖中的我”。

反观眼下的书稿,还真生出些江湖豪情,多了几分性情,少了几分伪饰。

现在,我要站在第11年的时间节点上,给这本书撰写序文。在这电闪雷鸣、暴雨倾盆、不敢开空调不敢用电脑的夜晚,用钢笔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画,内心反倒宁静得近乎致远了,几年前在杭州、在我的一部新书的研讨会上的发言,涌上心头。

那一天,我跟大家说,驱除骄傲心,驱除虚妄心,常怀感恩心。

这一刻,我仍然想说这三个短句。

驱除骄傲心,于我,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,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。在讲究出身、门庭、名校、衙门的当下中国,我的家庭出身,我毕业的大学,我的第一份工作,虽不至于卑怯,委实没什么值得夸耀的。可我尚未泯灭的谦卑告诉我,过去的日子里,我总是不能彻底摆脱傲物、浮躁、轻狂的坏毛病。

本书一校的时候,我仔细翻看了一遍,若干篇章,文脉不同,或淡定,或张扬,若干细节,文气相悖,或踏实,或轻薄,它们矛盾地组合在一起,将我的坏毛病一览无遗地表现出来。

我不想去改正,它们是我个人心灵历史的轨迹,也是一个过渡时代的新闻记者在中国转型时期梦想、挣扎、彷徨、游移的见证。姑且立此存照吧,日后,我还可以从中看出我年轻时代的真实面目,不会在遗忘中吹嘘自己的过去。

目 录

序 言	1
-----------	---

第一部 江湖中的“道”：我们是，而且只能是记者

第一章 “看不到晚霞，也看不到晨曦”	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我们是记者，不是商人，也不是政治家 / 4

我们是记者，不是牧师，也不是革命家 / 7

中国记者：过渡的一代 / 10

我们的态度、立场与价值观 / 26

第二章 记者的出路就是写字么	28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我们是记者，不是学者，也不是作家 / 29

一个诗人的记者尾巴 / 31

倡导一种农民式新闻观 / 34

一个商业记者的宪政哲学 / 38

微斯人，吾谁与归 / 41

记者的出路 / 44

第三章 一个世界，多种声音	52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媒体为什么要扒粪 / 53

记者和官员是什么关系 / 56

财富明星的媒体恩仇 / 59

当我面对张维迎 / 62

真相在他处 / 72

第四章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暧昧 77

如果波斯纳来到中国 / 78

秦晖教授家的茶水 / 80

与毛寿龙教授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/ 82

名利场 / 85

第五章 冠冕堂皇的职衔 88

专栏作家何时才能伟大 / 89

专栏作家是怎样炼成的 / 92

主笔是枝什么笔 / 95

无冕之王应该是啥样 / 98

第二部 江湖中的“术”：今天，我们怎样做记者

第六章 政治人物采访记 103

独家专访高级官员的背后 / 104

与许嘉璐喝茶 / 110

别了，成思危 / 113

李金华：英雄与时势 / 117

第七章 “两会”日记 120

等下去，就有收获 / 121

力拔山河“文”盖世 / 124

爱面子,还是爱新闻 / 127	
与民主互动的新闻,离不开声色犬马 / 130	
没有表情的新闻是僵死的 / 133	
第八章 全球化中,做最好的你	135
全球化改变了优秀记者的定义 / 136	
《经济观察报》式文体成功的历史必然性 / 142	
做最好的自己 / 145	
灾难报道中的人、人性与人情味 / 152	
2500年前的佛经,今天的新闻 / 164	
高僧对新闻人的开示 / 167	
第九章 新闻与法	171
我对国家领导人的专访是不是我的作品 / 172	
李金华能否向我要稿费 / 175	
绵阳市委书记有没有审稿的权利 / 178	
江泽民可否拒绝《华盛顿邮报》 / 180	
我是否抄袭了别人 / 183	
报社能否反对我出书 / 189	
朱永新的委屈 / 193	
编辑能不能改我的稿子 / 196	
第十章 放下枪比剑	199
什么样的新闻是好新闻 / 200	
商业报道中的大词现象 / 208	
专业的,有用的 / 213	
虚词掩盖了什么 / 215	

第三部 江湖中的“我”：且行且吟且醉

第十一章 美利坚乱想	221
游览美国新闻博物馆 / 222	
水门事件中的记者没有什么了不起 / 225	
美国报界的冬天 / 228	
不仅专业,而且通俗 / 232	
美国第一夫人可以做个好记者 / 235	
多少中国记者报道了美国大选 / 238	
今天,你的新闻全球化了么 / 241	
去战地,你会拆地雷么 / 243	
第十二章 十年一觉新闻梦	246
置身于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虚幻感 / 247	
是报馆,还是公司 / 252	
学习他们,而非贬低他们 / 255	
佛陀、愤青与爱 / 262	
为什么离职总是难免的 / 264	
不希望子承父业的过头话 / 267	
我最得意的新闻报道是什么 / 270	
忍看朋辈成新总 / 273	
第十三章 我们的时代我的书	277
写书这件事,很乱,很矛盾 / 278	
今天,我们该如何评价中国 / 283	
我没有越过新闻记者的底线 / 286	

驱除虚妄心,驱除骄傲心,常怀感恩心 / 289

我曾梦想像白宫记者那样写作 / 292

沧海一声“屁” / 293

第十四章 诗意的江湖生活 295

是什么把我们拽进了江湖 / 296

江湖通行证 / 300

无愤青,不江湖 / 303

江湖是需要兄弟的 / 306

以文会友 / 313

酒 / 316

江湖散了 / 318

致 谢 321

第一部

江湖中的“道”： 我们是，而且只能是记者

我们是记者，不是商人，也不是政治家；
我们是记者，不是学者，也不是小说家；
我们是记者，不是牧师，也不是革命家。

过去几年，我始终在为记者是什么不是什么而抓狂，陆陆续续的肯定和否定，是问道的声音，是对新闻价值观的追寻，我需要弄清楚，我为什么要做记者，我又为什么热爱新闻。

第一章

“看不到晚霞，也看不到晨曦”

“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，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，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，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，未来的人啊，你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。”

作为过渡时代的发言者，多年前记诵的赫尔岑的诗句，常常会触动我敏感的“新闻心”。我们不愿傍大款，也做不了世界新闻史上挂满勋章的扒粪者。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秉承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和立场，与我们的国家一起拥抱全球化，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中，与各种进步力量一道“咸与维新”。

本章中的四篇文章，第一篇是我一本老书的后记，喃喃自语地道明了我的认知，也暴露了我的软弱；后面三篇，是我为报纸杂志撰写的试刊词，或者记者节社论什么的，因为此类文章往往是以编辑部名义发布的宣言，所以，它们很豪言壮语，很大义凛然，很理想，很“大我”。

我们是记者,不是商人,也不是政治家

某年记者节,我为所在媒体撰写了一篇社论,主张记者应当返回职业原点,不但懂得新闻商品的最终购买者是公众,而非广告商,还须竭尽所能地限制我们咸与政治的冲动,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。

我们是记者。我们以采掘新闻为天职。我们传播新闻,让住在小村庄、小市镇里的平民像国王一样,享受知道的权利。我们的前辈,用马匹、用驿站、用邮差、用电报电话,我们用传真机、用可视电话、用手机、用伊妹儿。采集传播新闻的手段始终在变,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:自由而负责任地传递新闻,让公开、充足、未受污染的信息,驱散密室的阴霾,填平不对称的信息鸿沟,福佑公众。尽管真相永远在他处,我们虽不能至,但心向往之。

我们是记者,不是商人,我们的老板可以和客户讨价还价,我们会因为所在媒体广告收入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,但这不是我们贱卖自己的理由。足够的酬劳,完备的合同,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,可收入不是我们出卖公众知情权的借口。我们不是被人用枪逼进报馆、电视台、广播电台的,我们可以选择做银行家,我们也可以选择福利薪酬更优厚的媒体公司,我们不是终身受雇于哪一家媒体的“包打听”。

我们不是神话中的人,撒谎一次不会成为撒谎者,受贿一次亦不会成为文丐,但选择以记者为职业,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。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,尽可能客观、公正、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,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,如果我们把新闻当做商品的话。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,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,但我们不能因之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,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,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。

我们不是商人,但我们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,与其他媒体竞争。我们参与竞争,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,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的媒体市场,才能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,更为接近事实真相,更能实现公共利益,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。

我们是记者,不是政治家。像政治家宣示的一样,我们信奉自由、民主、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好的价值观。和百年中国新闻史上那些灿烂流芳的名字一样,我们视宪政中华为基本理念,认为宪政是最好的政治安排。但我们的职业是记者,不是政治家。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,不是新闻的制造者。作为一个公民,我们争取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宪政的路径,是记者的职业手段,而非政治活动。我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,但我们不能利用记者的权力,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,粗鲁地硬塞给读者、观众和听众。蛊惑、煽动、打倒、改良,是政治家的事情,我们仅仅负责报道。当然,任何一个记者,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,我们所要争取的,是竭尽所能地限制我们咸与政治的冲动,而不是放任。

我们是记者,我们是为公众守夜的“狗”,我们的使命是发现问题。理论上说,政治家也背负同样的职责。但西方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,政治家作为“家”的才华,有时候在于制造话题。备受关注的话题是我们靠近公众的武器,但我们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。记者的职业定位,决定了发现问题比制造话题更重要。转轨时期的中国,有向上的痛,也有向下的痛。如何理解“痛”的性质,用什么样的良方去医治“痛”,是政治家的事。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,而不是哗众取宠,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注视。

政治家看重意识形态,我们也是。就我们的现实而言,规范比意识形态更急迫。新闻学是一门学科,新闻业是一个行业,记者是一个职业,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,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,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。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“据悉”?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?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?可用“等等”无限罗列的技术问题,是否真的已被我们掌握?

看看我们过去的报道吧,想想我们究竟有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偏见,替代新闻业的技术准则?我们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的争执,就先验地假定政府在打压私营企业;不能一见大火矿难,就确定腐败的主题,再让事实迁就于观点。过去,我们失望于前辈同行“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

遭”的新闻价值判断,现在,我们要小心自己落入“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糟”的窠臼。

我们是记者,请返回我们的原点,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,既不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,也不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,并探究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,以免像少数政治家和商人那样,陷入意识形态和利润的泥沼。

我们是记者,不是牧师,也不是革命家

“我猜想,当我死后站在天堂之门的时候,我遇到的第一个人,将是美联社的记者。”许多年后,圣雄甘地的这段说辞,鼓舞了中国的我。但是,我只将自己当做一个疯狂追寻独家新闻的记者,而非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。

1932年,一个昏暗的午夜,印度著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甘地,背着自己的行李,离开了英国人的囚牢。

他被释放的消息极其隐秘,连他自己都不知道,那个让他脱离囚禁的火车站究竟在哪里,到底有多偏僻。

当他将行李拖上火车站台,有个人突然从黑暗中冲过来。他看清了,映入眼帘的是美联社记者吉姆·米尔斯的脸。过去,他报道了甘地为印度独立所做的一切。现在,这张熟悉的面孔又一次在他的眼前晃动。

那一天的新闻界,他是唯一知道甘地获得自由的记者。

甘地感慨地说:“我猜想,当我死后站在天堂之门的时候,我遇到的第一个人,将是美联社的记者。”

若干年后,这段鼓舞人心的说辞,不仅鼓舞了众多美国记者,也鼓舞了中国的我。我甚至会渴望,当我真的站在天堂门口的时候,我也能遇见我渴望遇见的新闻当事人。但是,我只会将自己当做一个疯狂追寻独家新闻的记者,而非一个救赎世人灵魂的牧师,一个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,一个砸烂旧世界呼唤新世界的革命家。

初为记者的时候,我有一种牧师般的道德优越感。直到今天,有的同行仍然会在言谈之间,流露出惟新闻独尊的优越感。他或者她,会在假想中设定自己的使命:以笔为枪,与邪恶作战,横扫一切牛鬼蛇神,还人间真善美。

我很钦佩他们的使命感,并且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论及使命感时的真